

马克·J.史密斯情境实践的整体社会知识观研究

乔瑞金, 乔 沙

摘要:马克·J.史密斯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杰出代表。他以澄清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客观性和情境性、事实与价值、封闭性和开放性、专业学科性和整体社会性等争议性问题为出发点,基于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的思想基础,在知识社会建构转向的现实背景下,提出在社会实践中以更少化约更多弹性反映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作为知识评估的标准,强调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情境实践活动,社会科学知识是情境实践知识、情境合理化的叙事知识、主客体情境互动的知识,是一种整体社会实践的情境知识,从而以社会实践为主词形成了情境实践的整体社会知识观的核心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知识观。

关键词:马克·J.史密斯;情境实践;社会实践;情境叙事;整体情境

作者简介:乔瑞金,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太原 030006);乔沙,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太原 03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史研究”(23&ZD017)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5.03.003

马克·J.史密斯(Mark.J.Smith)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家。他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观为科学研究的方向,形成了基于情境实践的社会科学的整体知识观,并把它贯彻于文化、生态、环境、政治、公民身份以及国家问题等研究领域,创作出版了《文化再造社会科学》《环境与公民身份——整合正义、参与与公民权》《重思国家理论》《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等蜚声中外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了特定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被大量引用和评析,引起广泛关注。史密斯的整体社会知识观以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的思想为基础,围绕情境实践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对人类知识的价值意义的分析,强调社会科学是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情境实践活动,社会科学知识是情境实践知识、是情境合理化的叙事知识、是主客体情境互动的知识、是一种整体社会实践的情境知识,从而以社会实践为主词形成了情境实践的整体社会知识观的核心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知识观。本文将围绕史密斯所言

“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知识”(即所有的知识都应该被放置到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考察)这一论断为基点,展开对史密斯整体社会知识观的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社会实践知识

史密斯以马克思关于人是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存在、人的活动的本质在于对世界的改造思想为基础,以复杂的人的社会现实活动作为其思考科学实践的前提,认为知识提供的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工具,强调任何知识都不是抽象的超越于社会实践之上的观念,而是来自于社会实践并且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参与了社会实践。史密斯指出:“科学是一种社会的实践,这句话是透过两种情境形式呈现:透过一个既定社群的文化和公共建制的生活,知识是社会情境的。藉由检视和分享传统的知识产物,知识是历史情境的。”^①无论是关于知识的有效性的评判标准还是关于知识的来源以及对启蒙科学知识的批判都依赖于社会实践这一准则和评估方法。

第一,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标准是社会实践。史密斯以知识观中长期存在的知识的本质在于客观性和情境性争议作为思考知识社会实践维度的起点,认为对知识的有效性问题的回答决定着社会科学的定义。史密斯首先对“科学知识通常被描述成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境”^②这一科学知识观提出质疑,认为科学知识有效性的标准在于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以及与日常实践的关联,那种认为所有客观性的知识都在寻求适用于所有情境的与特定研究对象分离的抽象知识的观念,是对复杂社会情境的简化,都是非实践的,是对社会实践的一种逃避,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形式。史密斯指出,有效的社会科学知识必须对社会变迁作出回应,“所有社会科学知识的形式,都是植基在那些已建制的环境中,以及人类的实践上”^③。在史密斯看来,当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被重新定义时,作为情境实践的知识必须有效地回应这些变迁。社会情境的变迁会形成不同的情境知识形式,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对社会变迁的理论表达,“只有在这些研究工具不再运作或无法运作时,社会科学家才会重新开始再思考”^④。科学知识是人类的产物,所有的知识都是合理化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在于用最适当的理论解释一个复杂的动态世界。史密斯看到当代人类的情境实践正面临三重因素叠加的社会情境,即全球化、环境变迁以及传播革命,这三重因素叠加的现实世界应该成为重新思考知识观的情境基础。与此同时,有效的社会科学知识是面向日常实践的知识。“假如社会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间没有强烈联结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值得去从事的工作。”^⑤这样,史密斯就把知识生产与运用的现实情境与目标指向二者勾连成一个整体,强调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联结,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理论工具,参与了人们的日常实践,社会科学知识就是要以理所当然的日常常识作为思考的起点,“它集中考察普通事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日常生活,所有微不足道的琐事”^⑥。对常识保持反思的态度,建立围绕在我们周遭事件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那些专业且被分离的科学知识间的桥梁。史密斯将这种勾连看成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间的基础社会科学方法”^⑦，“有效的社会科学能够传递复杂的社会关系,却不会使阅听人感到迷惑,同时并且能够对行动提供一个有用的指引”^⑧。

第二,社会科学知识的来源是社会实践。史密斯明确提出社会科学是一种情境脉络的实践的社会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18页。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页。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8页。

④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7页。

⑤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IX页。

⑥ Hassan Ihab, *The Postmodern Tu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1-92.

⑦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28页。

⑧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25页。

科学定义,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史密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来源于复杂的人类世界,以复杂的人类世界作为其思考的出发点,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参与了人类实践活动。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观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知识观,无论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观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知识观都是特定社会情境建构的结果和实践活动。“科学实践,甚至是自然科学实践,是一张历史传统紧密编织的网”^①,研究者必须要把研究对象放置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解释和理解,否则,一切的社会认识都无法进行。

第三,科学知识是启蒙时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史密斯从社会结构、知识系统和社会能动机制三方面考察了启蒙时代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就社会情境而言,科学方法成为启蒙时代新的思考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方法,符合社会实践的需求。启蒙时代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时代,人类被视为主体可以控制外在世界,培根和笛卡尔被视为科学基础之父,依据培根透过观察寻求真理的思维方式,真理来自于人而非上帝的观念强调的是观察和实验,科学被建立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科学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依据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启蒙将人类意识视为理性的中心,理性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回到启蒙历史情境,“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竞争的概念”^②,在启蒙情境中,培根和笛卡尔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笛卡尔以一种与宗教信仰相容的方式来使用新的知识,笛卡尔在身体和心灵之间画出一条分割线,首次确立了知识的非宗教信仰基础。“笛卡尔不只单独地使用人类理性,而且也发展出一套上帝存在的辩护哲学”^③,笛卡尔的情境合理性就在于许多神学家愿意接受心灵与身体的连接只有通过上帝的直接介入才能完成,这样就符合了启蒙时代过渡阶段的特征,获得了更多天主教信徒的信任。培根透过建立实验方法来避免信仰遭受质疑的危险,科学知识的成功主要依靠与当时宗教观念的联结。就社会科学而言,早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启蒙时代普遍接纳的科学实证主义成为社会科学获得社会共鸣的权威知识形式。

二、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情境合理化叙事知识

史密斯指出,“知识根本没有固定的基础,而科学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位置中被建构”^④,这里的情境在史密斯看来分为社会情境和历史情境,其中,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edness,指的是一种有自己价值和思考的特殊文化)和历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edness,指的是特殊的传统思想)。⑤情境是一种包含着特定价值的社会文化,“所以若要定位科学,就必须从它所在的文化场域着手”^⑥。而情境知识则不断合理化着社会世界,提供关于社会世界的令人信服和最适当的阐释。“每个真理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都可以是真的”^⑦,这样的知识很难用一种单一方式去实现,而只能走向一种情境叙事知识。

第一,知识观的变迁凸显出知识的价值立场。史密斯从知识观中的事实与价值的争论作为思考起点,认为科学知识中的事实与价值的争论问题从启蒙知识开始始终伴随着不同的知识观的变迁。事实与价值的争论一直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条线索存在于启蒙科学知识中。经验主义以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直接单一性作为获得客观性知识的基础,假定了经验事实的普遍同一性以及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分离,价值不能涉入事实并被排除在客观知识之外,而理性主义者认为经验观察不应该

① P. Feyerabend,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1981, Vol. 1, p.4.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2页。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72页。

④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333页。

⑤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3页。

⑥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8页。

⑦ Goodman Nelson, *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30-35.

介入理性逻辑的思考。在早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应用大量的自然科学的类比和隐喻,将社会类比为人类有机体,以一种解剖学的方式呈现,这些类比隐喻中包含了大量的价值意涵。史密斯指出,“实证主义者的社会科学两个明显的特色:即他们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信仰,以及他们将自己文化价值和偏见转化为客观事实的能力”^①。例如孔德在定义分析客体时,将人类视为只由白种人所组成,反映了孔德所处的19世纪欧洲社会广泛的价值假设。斯宾塞的功利主义社会科学观假定了理性个体的理性选择能力,继承了达尔文的最适者生存的观念,是一种以客观事实的形式存在的欧洲种族优生学的合理说法。涂尔干使用医学和有机体的隐喻,将社会事实以一种正常或偏态的客观知识进行分类。史密斯指出,“从被那些深入镶嵌的文化价值中,分离出社会科学所强调的事实论述,是非常困难的”^②。

观念论质疑经验事实的单一直接性假定,思考经验如何形成的问题。康德作为观念论的先驱,试图调和启蒙以来所形成的笛卡尔理性主义和培根经验主义的二元分裂,对感官经验事实的直接单一的优先性提出质疑,发展先验概念,指出经验是先验立场的体现,就将经验事实问题复杂化,经验事实的形成过程中有多元的价值立场的涉入,凸显了人类的想象力在经验事实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立场在观念论看来,是来源于人的心智结构。新康德主义者也试图调和客观真实与主观价值,文德尔班提出了律则性方法和个例性的方法将研究自然客体和研究社会世界区别开来。李尔凯特发展了可信赖的知识与有效的知识。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社会事实是理性个体的主观价值和有意图的选择所形成的行为结果,诠释学包含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观面向,狄尔泰试图发展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人类科学,将人类的价值、观念、欲望视为是理解社会生活的不可避免的部分。现象学形成了对日常经验的关注,强调科学事实形成的背后我们已经使用了大量的理所当然的常识假设,强调日常生活主体间的自我、互动和意义的阐释,将焦点放在处于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人类生活经验。舒滋发展了社会世界的现象学,提出世界是透过那些能够理解彼此意识的行动者的互为主体的状况被理解的。舒滋认为,没有所谓的硬性事实,所有的只是诠释,事实是经由相互主观互为主体的状况产生的;我们应该辨识出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的食谱知识,发掘联结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方法。观念论的各流派实现了科学知识的价值关联原则和社会情境转向。

由史密斯对知识观变迁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知识观变迁的过程就是价值不断涉入事实的过程,价值成为知识观变迁关注的焦点。在史密斯看来,“价值是任何社会世界研究的一个关键成分,即使我们仍有想要隐藏自己价值立场的倾向存在,但这些价值立场仍旧存在于研究之中。……我们将大胆承认知识的文化价值场址”^③。情境实践的知识观将观念论凸显的价值立场指向整体的社会情境实践,将价值和社会实践关联起来,实现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情境实践的转向。“社会研究者的价值,或甚至是社会科学家组织社群的价值,对于知识被建构的方式是有其形塑的效果。即使只是简单地以描述形式呈现的陈述,都能够隐藏重要的标准假设。”^④

第二,知识观的语言文化转向带来对知识再现问题的考察。在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再现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的陈述被逻辑实证论者视为是所描述事物的图像或速写,就像是镜子的反射作用一样,可以完全地反映事物真实”^⑤。科学陈述作为客观化的陈述,以制造普遍化概念为基础,试图实现全称陈述,而社会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反例随时出现,科学陈述的普遍有效性成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76页。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21页。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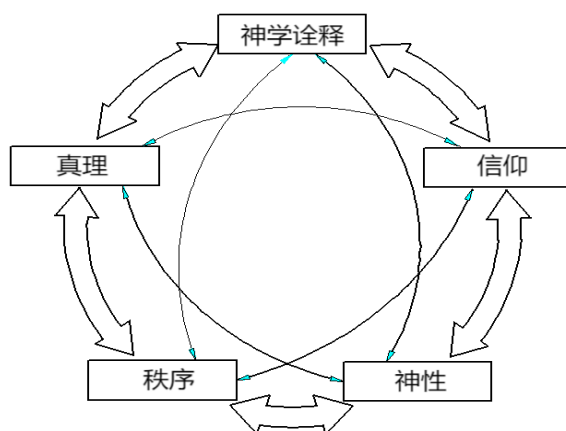
④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39页。

⑤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40页。

为问题。史密斯指出,“我们从来就不能确切地确定任何有关于世界的陈述,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不确定状况的可能性存在”^①。波普通过否认论来质疑科学归纳法,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可容忍的范围内,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和合理的方式,去检视每一个事件的可能解释”^②。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是一连串的游戏,指出“将世界视为是只存在于语言之中”^③,同一个证据可以不同的方式被诠释,诠释的结果主要依靠于每个观点背后的假设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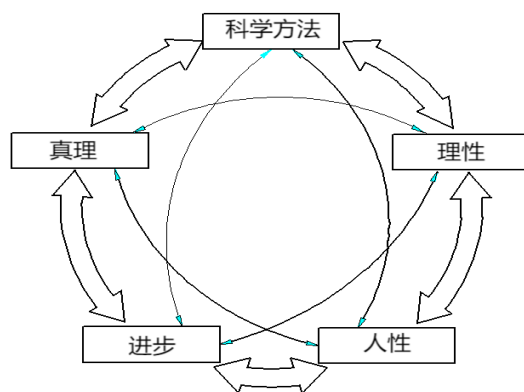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传统实证主义的反映论的语言观的彻底颠覆,带来了再现问题的重新思考,“语言同实在世界不具有直接关系。相反,它只是一种象征关系”^④。索绪尔否定了实证主义式的科学知识,指出所有的字词都包含着意义,人类行为反映我们所处位置的价值观。索绪尔启发了知识观中的文化转向。史密斯聚焦于知识观的再现问题,指出“一个再现的系统,指的是组织和安排一系列概念的一个方法,而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一个解释世界的说法”^⑤,同时指出语言、论述和文化是思考知识再现系统的重要取径,将语言、论述及文化视为是一个思考知识再现的方法。知识领域的名词和概念,“是一堆对于‘社会世界如何被组成’以及‘如何以最适当方法研究它的假说和观念’的速记,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⑥。知识作为一种再现系统,是由语言作为中介来呈现世界。“除了修辞学意义以外,表象对社会无其他的意义。”^⑦在从理所当然的常识背后看到文化价值的建构,社会科学的再现是文化再现,这个过程是一个情境诠释的过程,应该将所有形式的学问都视为是一种语义修辞。论述控制了意义的生产和实践,再现系统就是论述,论述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意义都是暂时的,我们永远不能将文化认同固定下来,意义的产生是不断改变的,任何意义仅具有有限的社会历史情境性。

第三,任何一种知识都是特定情境的叙事知识。史密斯给出了从前现代知识、现代知识到情境知识的情境叙事的变迁图。(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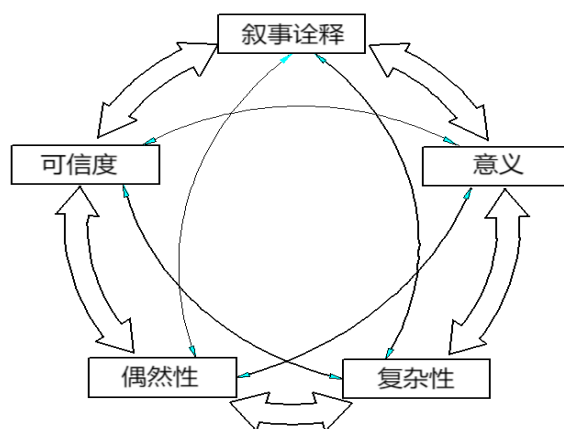


a 前现代知识循环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57页。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58—159页。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208—210页。
 ④ Ryan Michael,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74—575.
 ⑤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9页。
 ⑥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1页。
 ⑦ Barthes Roland,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33, 56.



b 现代知识循环



c 情境实践知识循环

图1 知识情境变迁图^①

史密斯在思考前现代的神学知识循环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循环的基础上给出了情境实践知识循环图。知识作为再现系统是一种合理化情境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需要有合理化的叙事策略和合理化的竞争过程,情境知识是不断合理化的叙事,时刻处在竞争性的场域当中。史密斯指出,最有效的理解知识观的方式,就是视它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中的其他元素的联结关系而定。在这些知识循环中我们能看到一种知识观的社会情境合理化的故事。前现代自然和社会世界被概念化为神的意志结果,宗教机构担负着诠释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角色,这个社会秩序是由上帝赋予的。只有经过经文所建立的架构运作下的辩论才被允许。在现代世界中,人类已经被视为是知识的来源,现代社会开启了人造而非神造知识的出现。理性能够增进人类进步并企图建立起理性时代,特别强调人类改造他们所居住环境的能力,科学知识被视为是确保人类安全和使未来更加美好的工具。“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复杂和矛盾过程转移了前现代信仰系统的组织安排,并允许非宗教的科学观点,变成建构权威知识和建立新社会机制的优势架构。透过现代化过程开启的变迁,改变了社会的风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得先前思考模式的所有心灵地图变成瑕疵或冗余的。”^②科学叙事方式是一种信任叙事,科学知识追求价值中立,没有偏见,通过包括封闭系统的一组有限数目的可测量变项,单一因果关系,科学律法、简化思维、有机类比等客观化的叙事策略成为启蒙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叙事方式,而将其他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叙事策略排除在外。科学的方法作为一种合理化的情境叙事透过与真理、理性、进步和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84—486页。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82页。

人性的关系而被解释,科学方法提供了一种真实确定性的权威叙事,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普遍的科学信仰。史密斯指出:“科学方法的成功,是因为它具有显现真实的能力,而这同时也意涵着人类思考能力的使用也是如此运作。这个寻找真实的动作,被假定为一个反映人性需求的意图活动,而这个活动的结果,将会使得人类更加的进步。”^①

史密斯在阐释前现代神学知识观和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基础上,指出启蒙所带来的科学知识观与前现代神学知识观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两者构成的知识循环之间保持了强烈的连续性。“这两个循环都宣称只有透过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建立和铺设起到达真理和确定性的道路。如果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处的世界与过去并非是根本的断裂,而我们也从未进入现代时期,或许就如同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也许我们视为是现代的时期,最好应该被描述成是‘新中世纪’时期(neo-medieval)。而就像罗逊所说,在此时期,也只不过是科学家取代了神职人员去执行对于真理的护卫罢了。”^②在此基础上,史密斯重新思考了知识的循环,给出了情境叙事的知识循环图,这一知识循环强调任何对象的研究都要以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前提,科学实践是一种如此复杂和不确定的实践,任何意义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叙事阐释中,任何知识都指涉意义的诠释,科学家只是以社会可接受的合理化的方式来生产知识,寻找一种特定社会情境可信赖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将社会科学的实践,视为是种合理化阅听人所关心事物的阅读、书写和论述的方法。当这些阅听人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以各种方式来诠释自己的故事时,事实上他们也正主动地在制造意义。”^③通过抛弃真理主张,它肯定了“听、问、讲”等更加平和的实践。^④

三、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主客体情境互动的知识

主客体关系问题始终是知识观中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史密斯情境实践知识观在批判实证主义封闭系统的基础上走向社会开放系统,在社会开放系统的场域中思考主客体的关系问题,走向主客体情境互动的知识观。

第一,知识主客体关系思考起点是知识的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争议问题。史密斯指出,“封闭的观念已经是所有被视为是客观知识的学门颇重要的一部分”^⑤。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知识以建立人工的封闭系统作为产生客观知识的前提假定,从现实的社会世界中抽离出来,以简化思维方式创造了抽象的理性知识,情境实践知识是指向人类实践活动,而非抽象理性,因此情境实践知识必须以开放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作为知识产生的前提假定。史密斯给出了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比较图。(如下页表1所示)

在对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比较中,史密斯揭示了封闭系统的单一性和开放系统的复杂性,封闭系统中单一的因果关系和开放系统中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封闭系统中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和开放系统中的复杂个体。史密斯对实证主义知识产生的封闭情境产生质疑,并且对实证主义知识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的宣称提出了批判。“假如我们认为社会生活牵涉的是开放系统,包括有固定特质的个体,那么因果法则的概念,就是完全植基于一个封闭系统不再维持的状态下,所建立的清楚变项间的实证规则,其结果是否适用于开放系统的真实情境中,是值得存疑的。”^⑥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7页。

②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83页。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85页。

④ Ashley K. Richard, R.B.J. Walker,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 Dissiden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0, Vol. 34, No. 3, pp.259-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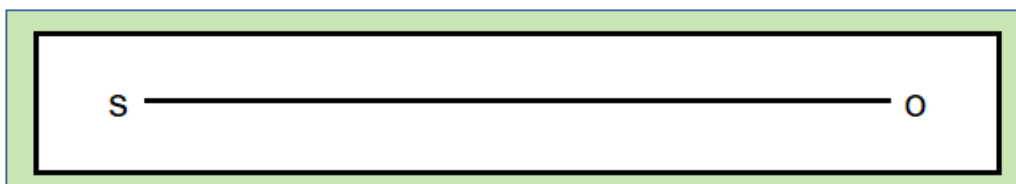
⑤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60页。

⑥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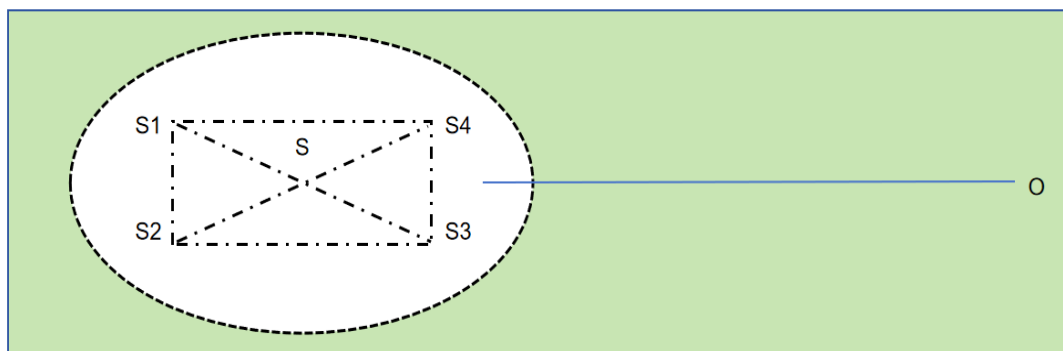
表1 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比较^①

	封闭系统	开放系统
单一性和复杂性	一组有限数目的可测量变项,可增加辨视和预测清楚关系的可能性	一个复杂的状态,指的是分析客体的所在情境和在客体与情境间的关系
外在界限	排除条款保证了那些可能影响结果的混淆大量因素,是被排除的(就像是其他因素不变定理所说,当你掌握了所有其他事物的常数时,X就会得出Y)	没有外在界限,提出了每个客体都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中的一部分存在着的假说,因此没有一个原因,可以有任何程度的确定性去预测一个结果
内在特性	所有分析的客体只被测量其表面价值,以至于一个客体的内在特性并没有被考虑在内	认为所有的客体都有影响其在不同情境中运作的内在特性和结构

第二,情境实践知识是主客体同一情境辩证互动的知识。史密斯给出了不同知识观中的主客体关系的变迁图。(如图2)



a 四个看待主客体关系的方法:步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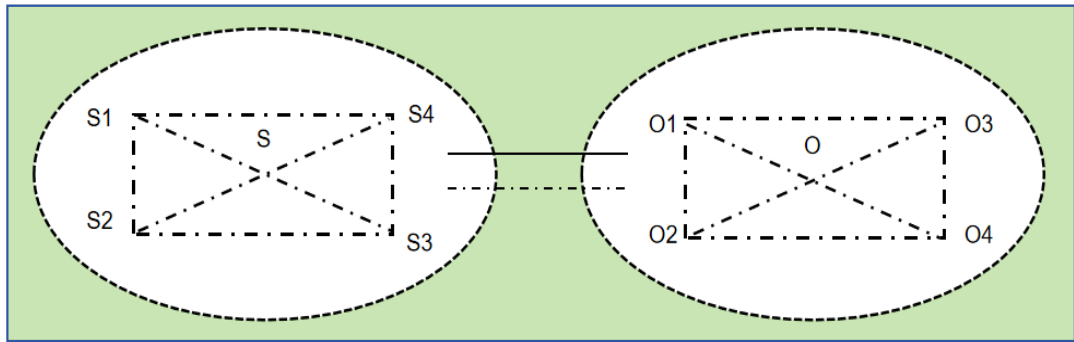
-----语言社群的界限

-·-·-·-社会关系

S1、S2.....Sn为其他语言社群中的认知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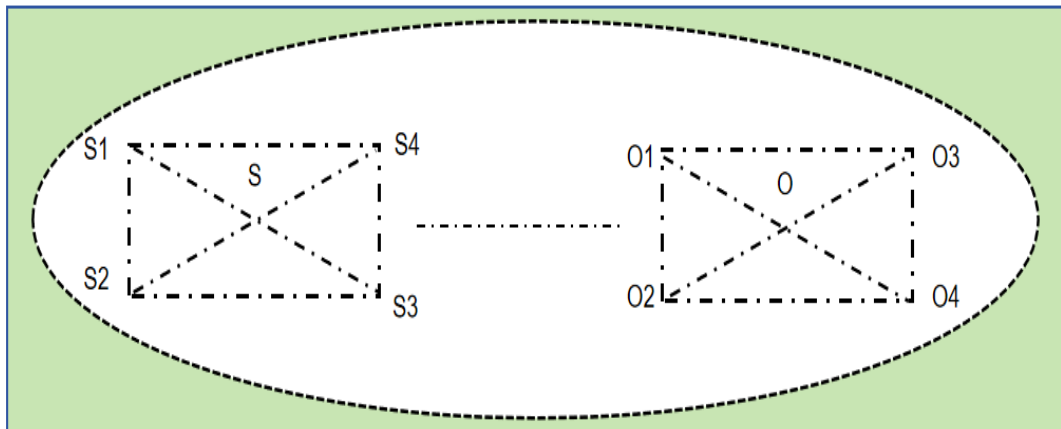
b 四个看待主客体关系的方法:步骤二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65页。



-----语言社群的界限
 -.-.-.-社会关系
 S1、S2.....Sn为其他语言社群中的认知主体
 O1、O2.....On为社会对象

c 四个看待主客体关系的方法:步骤三



-----语言社群的界限
 -.-.-.-社会关系
 S1、S2.....Sn为其他语言社群中的认知主体
 O1、O2.....On为社会对象

d 四个看待主客体关系的方法:步骤四

图2 四个看待主客体关系的方法^①

“主体是现实社会的一项发明,是启蒙和理性主义的产儿。”^②实证主义为了创造客观知识以封闭系统假定了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主客体分离,假定人类理性作为主体和自然作为客体,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科学律法,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假定了价值中立的绝对权威性。“主体是一个中心,一个至高无上者,一个分析的英雄,一个拥有对外在的和内在的现实作出直接理解和非

①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73—474页。

② Wellmer, Albrecht, “On the Dialectic of Mor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1985, Vol. 4, No. 4, pp.337-362.

凡洞察力的个体。”^①主体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客观对象身上,将研究者自己的价值立场转化为客观类目,研究对象被视为被动接受器,进行分类化处理。“作者仍然被假定为是有特权的——纵然不是终极的——‘意义的决定者’。”^②文本被认为是“天才之作”,读者只需发现这些意图便可明白文本的确切意义。^③在社会科学领域,观念论对实证主义封闭系统以及实证主义所预设的单一的主客体关系提出过质疑,使得简化论的知识观走向复杂化,强调人类价值、意义、阐释在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与实证主义将心灵视为被动的接收器相比,观念论将心灵视为创造性机制,这样不同的研究主体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就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但对于观念论者而言,“这一传统坚持客观主义的认识定位,希望通过对人类意义的研究来认识客观现实”^④,观念论仍然以追求普遍有效的科学知识为目标。库恩所带来的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地位。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谈到了西方世界中的理性危机。他认为,科学知识并没有形成关于外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只是反映了科学社群中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库恩的巨大贡献在于“科学信念中历史转换的认识(包括科学观本身的转换),以及社会过程在科学共同体产生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引入到了争论的核心”^⑤。库恩提出了范式概念,对于知识的真理观形成了彻底的解构。库恩认为,知识是社群的产物,会随着社群观点的变化而改变。范式是科学架构,这个架构为某种科学研究社群提供了标准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之道。^⑥库恩将科学知识置于历史和社会的实践脉络之下,科学局限在科学社群中。科学知识是一项社会产物,科学知识会随着社群的周期性变化而产生变化。库恩带来的科学革命,促使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当科学革命转移到研究人类事物时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研究自然事物和研究人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史密斯认为,当“我们研究社会生活的同时,我们也正在研究自己”^⑦。在情境实践的知识观中,研究者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和研究者处在相同的社会情境中,“他(她)只是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者的身份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⑧。研究者所创造的文本具有独立性,是一个多元的文本。文本从“阅读者文本”走向“书写者文本”,文本“是一架制造解释的机器”^⑨,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意义的多重性,整个人类世界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整体的社会情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了“类似于中世纪狂欢节的共时关系”^⑩,即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辩证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将自己的主观经验和研究对象分开。唯有透过承认科学概念的结构和社会关系两者间联系的存在,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人类的生活。”^⑪史密斯借鉴了舒兹的“陌生人”的观点提出了社会科学家应该保持“陌生人”的角色。区别于传统科学知识观中社会科学家作为知识保管人的精英科学家的角色,社会科学家要对知识观保持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不断对变迁的社会情境

① Hawkesworth Mary,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in *Signs*, 1989, Vol. 14, No. 3, pp.533-557.

② Skinner Quenti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History and Theory*, 1969, Vol. 8, No. 1, pp.3-53.

③ 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

④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35.

⑤ Ted Benton, Isin Craib,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algrave, 2001, p.60.

⑥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viii.

⑦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9页。

⑧ Bauman Zygmunt,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5-8.

⑨ Eco Umberto, *Travels in Hyper Reality*, Calif.: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83, p.2.

⑩ 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⑪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10页。

做出回应,同时社会科学家要和社会生活保持深度的联结,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作为桥梁,既参与日常生活但又能相当程度的和这些日常生活保持一段距离。有效的社会科学能够传递复杂的社会关系,却又不会使阅听人感到迷惑,同时能够对行动提供一个有用的指引,以便破除现代科学中主客体二分关系,中断主体范畴所拥有的独断权力,消除隐含的等级系统,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回归到社会分析上去,放置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情境中。

第三,情境实践是一种主客体辩证互动的社会结构性实践。传统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终实现科学知识的情境化,这一过程是通过抽象的思辨实现的,违背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不是人类的唯一目标,理论最终是指向社会实践的,有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和需要,传统理论优先的知识观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分离,所形成的知识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世界有着巨大的差距。随着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提出,科学哲学家普遍认识到要想超越传统科学哲学的困境,必须要以实践为基础,对“经验”概念进行重新定位。科学实践哲学一改传统科学观的理论优位,用实践优位代替理论优位,形成一套具有实践特征的科学哲学体系,将实践看作整体,包括理论的实践也属于实践的一部分,将实践作为生活的形式,“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①。史密斯的情境实践知识观以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为背景,其知识观始终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线索,始终从社会实践的维度考察知识的来源以及评判知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这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结构性实践,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客体和作为能动性的社会实践主体之间形成的情境辩证互动实践。这一实践的哲学观的基础来自于罗伊·巴斯卡尔的批判实在论的结构性实践理论。巴斯卡尔在批判了两种错误的知识结构,即具体化和唯意志论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结构性实践的知识观。具体化所牵涉的是关于关心那些不被注意的情境或是不预期的行动结果,唯意志论将焦点放在行动者的意图和目的上,忽视了情境或不可预知的行动结果,两者都存在单向性的毛病。巴斯卡尔认为,结构既是永远存在的条件即物质原因,也是一种在生产人类能动性和使其产生变迁的结果。社会结构“是既理智又盲目、既个别又集体的人类行动的结果”^②。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相生相长的辩证循环关系。巴斯卡尔给出了个体和社会结构关系转换模型。(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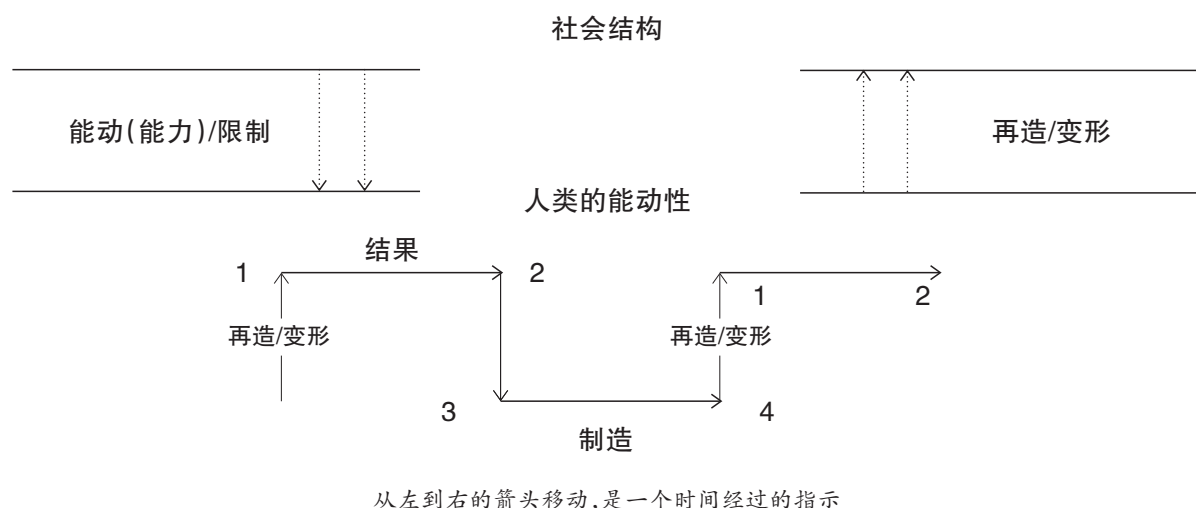


图3 个体与社会结构关系转换模型^③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3页。

② T. Luckmann, *Life-World and Social Realitie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3, p.79.

③ 马克·J.史密斯:《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第480页。

巴斯卡尔指出,社会-个人转换模型具有结构的二重性和行动的二重性。从社会的二重性来看,社会是人类实践行动的条件,又是人类实践行动的结果;从行动的二重性来看,个体是有目的的生活活动,同时延续与变革了社会结构的条件。社会结构依赖于人类实践的能动性而存在,同时,人类实践的行动需要在社会结构、制度与背景下才能组织完成。透过将结构视为是人类产生的过程,这样批判实在论的结构性的知识观就成为将人类从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并使用这些知识去改变社会被组织的方式。这些解放性的叙述讲述的是“失势者们的集体故事……他们的生活被放到了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背景中来考察”^①,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解释日常生活而且还在于改造日常生活”^②。

四、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整体社会情境知识

传统实证主义知识观往往以创造具有独立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专业的学科性知识为目标。区别于实证主义学科性知识将人类世界形而上地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领域所虚构的封闭情境,史密斯的情境实践知识是面向整体的社会现实情境的。在他看来,学科性知识仍然是对面向社会世界的知识的形而上的表达,与“真实”的知识存在在很大的差距。在对学科性的形而上知识批判的基础上,史密斯走向后学科制的整体社会情境的知识生产模式。

第一,整体社会情境知识是对现实社会发展状况的系统反思。传统实证主义为了寻求普遍性的人类知识系统,往往通过将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类目处理,学科专精化的发展将每个知识领域进行切割再切割。每门社会科学的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学科空间,清楚地定义了自己的分析对象,并且有独立的概念和权威经典资料。实证主义学科性客观知识试图建立超越时间和任何情境的永恒知识,而这种简单化的虚构无法回应社会历史的变迁,并且将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的文化价值和偏见转化为客观的类目进行处理,也无法回应作为权威知识的整体社会情境的普遍有效性问题。质疑学科制知识的生产而走向后学科制的整体社会情境知识的生产就成为情境实践知识观变革的思考焦点。

第二,整体社会情境实践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的复杂实在可能只有在整体层面上时才能显现。这种方法又叫作‘整体论’,并且这个方法与语境论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③因此,情境论强调的是社会整体情境,它要对整体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做出回应。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情境化了的对象,任何脱离了具体情境的抽象化都必然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本然关系,都不能对研究对象作出充分的理解。任何单一的学科性知识都无法生产出能够对复杂社会情境做出回应的真理性知识,传统的学科制的知识生产方式受到了挑战。史密斯在批判传统的学科制知识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如下页表2)

传统学科性知识生产的是真理性权威知识。基于一种严格的专业性的学科划分,有着严格的学科研究领域和基本的学科研究方法,通过专业的学术机构去传播和发展。在史密斯看来,我们必须假设研究者应该承认社会关系、组织和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都应该以一种更多弹性、更少化约和更多怀疑的态度去从事研究,更应该以一个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实现多元化方法的融合。这样的知识生产采取后学科的方法,涉及一系列的行为者,涉及一个合作的问题,产生的是对各方利益主体都有用的知识,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形成的知识。知识生产发生

^① Richcadson Laurel, “The Collective 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Writing of Sociology”, in *Sociological Focus*, 1988, Vol. 21, No. 3, pp.199-208.

^② Huyssen Andreas,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57-158.

^③ 罗杰·特里格:《理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导论》,殷杰、孟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在各部门和实验室,也在智囊团、机构、研究中心和咨询网络中,达到了学科知识不能触及的部分,后学科整体情境实践知识被看作是对产生同一知识的质疑的回应。后学科研究涉及知识生产者和多个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沟通过程,是各个参与方共同协调的过程,是对当下社会现实复杂性问题的有效解决路径,为各种标准在评估所产生的知识方面创造空间——用社会性知识取代真理性知识。

表2 学科制知识生产方式和后学科制知识生产方式比较^①

知识生产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难题解决 知识基础	难题通过学术共同体确定与解决 学科性的	难题在特定情景下确定来解决 跨学科性的
组织同一性/多样性的程度 组织形式	均质性的 等级制的	异质性的 非等级制的和易变的
知识交流	通过既存的制度渠道扩散(同行评议的 杂志、会议)	难题解决的扩散和新情景下的应用(交流 网络)

结 语

马克·J.史密斯以知识发展中的经典问题即知识的客观性与情境性、事实与价值、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知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专业学科性与整体社会性的关系处理作为其知识观思考的起点,基于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的思想基础,在知识社会建构转向的背景下,坚持更少简化更多弹性的立场,以回应现实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作为知识评判的标准,在批判实证主义和观念论以及后现代情境下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其情境实践的整体社会知识观。

第一,从知识观的客观性和情境性的问题出发,史密斯在批判实证主义客观知识的虚构性的基础上,指出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社会历史情境实践知识。所谓情境性就是必须对社会情境做出回应以及和日常生活直接关联。这样的知识必须以最适当的方式回应复杂的社会现实世界,同时作为人们社会实践的理论工具,必须从理所当然的常识出发,对其保持批判精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给人们改变现实世界的活动以指引。

第二,从知识的事实与价值问题出发,史密斯在不断探究知识观的变革历程中揭示知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价值假定不断凸显的过程。这种价值立场以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在史密斯看来,语言、论述和文化的重构成为发展阐释性知识观的重要契机,开创了全新的知识观研究途径。各种流派的知识观都可以作为一种合理化的情境叙事,无论是前现代的神学知识观、现代的科学知识观还是后现代的知识观,都是一种特定情境的合理化叙事策略和各种叙事竞争的结果。因此,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情境合理化的叙事知识。

第三,从知识的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问题出发,史密斯在批判传统实证主义人为制造封闭情境的基础上,强调社会科学知识面对的是社会开放情境这一现实前提,所有的知识必须以承认这一前提作为思考的起点。史密斯进而探讨了从封闭情境到开放情境中不同知识观主客体关系的变迁,知识观中的主客体关系经历了从简化论的单一主客二分到主客体情境互动实践的变迁过程,情境实践知识是一种主客体情境互动的知识。

^① M.J. Smith, P. Pangsapa, "New Controversies in Phenomenology: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Discourse", in W. Outhwaite, S. Turner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London: Sage, 2007, pp. 384-404.

第四,从专业学科性和整体社会性的关系出发,史密斯在批判传统实证主义专业学科知识的形而上学性基础上,回到知识的现实社会历史情境性中,指出情境知识是面向整个社会历史整体情境的知识,是一种区别于专业学科知识的后学科性知识,这种知识的核心就在于打破学科分割,走向社会整体情境,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是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机构、各个参与主体共同合作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实践。

上述分析表明,情境实践的社会知识观以社会知识所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形成知识集合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共同指向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社会科学知识观的前提假定,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作为实践的知识所具有的导引人类实践活动方向的价值旨向,体现出人类建构最适合表现社会现实复杂性的知识体系的努力。史密斯的情境实践的整体社会知识观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观的内在特质,是当代知识观对复杂现实世界情境的理论回应。史密斯始终坚持和继承被实证主义科学观所忽略的现代科学观的批判精神,在不断批判实证主义、否认论、各种观念论以及后现代知识观的基础上,建构了情境实践的知识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在实践活动中内在统一的知识论理念,为提升人类变革现实世界的能力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责任编辑 付洪泉]

Mark J. Smith's Study on the Whole Social Knowledge View of Situational Practice

QIAO Rui-jin, QIAO Sha

Abstract: Mark J. Smith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itish neo-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He starts from clarifyi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objectivity and situationality, facts and values, closure and openness,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and overall sociality that have long exis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ociety, it is proposed to reflect the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real world with less reduction and more flexibility in social practice as the criteria for knowledge evaluation, emphasizing that social science is essentially a situational practice activity that changes the real world.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situational practice, the narrative knowledge of situation rationalization, the knowledge of subject and object situ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whole soci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 core idea of the whole social knowledge view of situational practice is formed with social practice as the main word, and the social knowledge view of Marxism is enriched.

Key words: Mark.J.Smith, situational practice, social practice, situational narrative, overall situation